

文艺理論专业學習参考材料

(七)

《文心雕龙》譯注

周振甫 选譯

中共中央高級党校

一九六二年十月

为了帮助大家閱讀《文心雕龙》，特將周振甫發表在《新聞業務》上的譯文及注解翻印，僅供參考。

語文教研室

目 录

征聖.....	1
宗經.....	10
史傳.....	18
諸子.....	25
論說.....	30
詔策 檄移.....	43
神思.....	52
體性.....	61
風骨.....	66
通變.....	72
定勢.....	80
情采.....	88
鎔裁.....	95
聲律.....	100
章句.....	108
麗辭.....	116
比興.....	123

《征 聖》

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文学批評和討論創作的第一部专著，《征聖》是其中的第二篇。作者刘勰，字彥和，东莞莒（山东莒县）人。《文心雕龙》是他在南朝的齐朝时代写成的。《征聖》篇是說明讲創作理論要从聖人那里找到根据，也就是要从儒家的經典里找到根据。这正是当时人迷信儒家經典的表現。可是由于他要从聖人那里去找根据，便提出了創作理論，再用儒家的經典来印証这些理論。这样，这篇文章里就既有創作理論，又有实例来作为印証，理論跟实例結合起来，在写作上可以給我們一些借鉴。

这篇的开头，提出政治教化要注重文章，行动要注重文章，个人的修养要注重文章。又引事实作証，証明用文章来为外交服务，为政治教化服务，为个人的修养服务。这些論点，比起稍后的梁蕭統《文选序》把《魯仲連义不帝秦》那些文章，排斥在文以外，认为“虽传之簡牘，而事异篇章”来，就显得他的意見更高明。

接下去談到写作，作者提出四种不同的表达方法，两两相对，即“簡言以达旨”和“博文以該情”相对，“明理以立体”跟“隐义以藏用”相对。“簡言”和“博文”，就是写作上的簡和繁的問題，“明理”和“隐义”，就是写作上的显和隐的問題。这些問題曾經引起长期的爭論，《征聖》篇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些問題来，把这些問題的相互关系，应该怎样解决，作了扼要的全面的說明，并且举出具体的例証来印証。

关于繁簡問題，毛主席在《反对党八股》里說：“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：空話連篇，言之无物。我們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，

但是没有什么内容，真是‘懶婆娘的裹脚，又长又臭’。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，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？只有一种解释，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。因为长而且空，群众见了就摇头，那里还肯看下去呢？”又说：“长而空不好，短而空就好么？也不好。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。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，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脚，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。或者有人要说：《资本论》不是很长的么，那又怎么办？这是好办的，看下去就是了。俗话说：

‘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。’又说：‘看菜吃饭，量体裁衣。’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，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。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，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。”毛主席这些话，对文章的长和短，也就是繁和简作了最正确、最深刻、最全面的指示，指出这是有没有内容的问题，这是有没有群众观点的问题，这样才能根本解决长和短的问题。

在《征望》篇里刘勰对这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说：“故知繁略殊形，隐显异术，抑引随时，变通会适。”指出繁简隐显是四种不同的表达方法。抑是抑止，指简；引是引申，指繁。或抑或引，或繁或简，要看当时的需要。或隐或显，要适应当前的情况来加以变通。这就是毛主席说的“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，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。”刘勰并不象后来的作家那样，有的认为简是高古，极力求简，于是苏轍編《古史》，把《史记》里的“母，韓女也。樗里子滑稽多智。”简成“母，韓女也。滑稽多智”。张冠李戴，把樗里子的滑稽多智，变成母的滑稽多智了。有的极力求长，繁琐不堪，有人譏諷那样的文字，象博士写卖驢文契，写了三张纸，还没有写到驢字。有的力求隐晦，使人看不懂，象欧阳修的取笑宋祁那样，“开门大吉”要写成“札闔洪休”；有的力求显露，写得毫无含蓄，一点没有余味，读者不要看。刘勰指出应该根

据不同時間不同情况来确定一种写法，提得比較恰当。

其次，繁簡和隱显的表达方法，究竟各自适宜于怎样的場合，刘勰对这个問題也表示了他的看法。怎样的場合應該繁，怎样的場合應該簡，这很难說死，只能結合具体的例子来考虑。刘勰用四个“或”字，表示四个表达方法用在各自适宜的場合，下面結合实例来談。象举出“《春秋》一字以褒貶，丧服举輕以包重”來說明簡。《春秋》是古代的大事記，記得非常簡單，好比报纸上的新聞标题，比方郑伯处心积虑要赶走弟弟公叔段这一件情节曲折的事件，《春秋》只用一句話来記它：“郑伯克段于鄆。”在这样新聞标题式的記事中，作者还要表示他的态度，是贊成郑伯还是反对郑伯，在这样的場合里，只能用簡的表达法，所以孔子只用一个“克”字来表达他的意見。因为战胜敌人叫克，用克字說明郑伯把弟弟当作敌人，这是表达他責备郑伯的意思。再象《礼記》里記“總不祭”，總麻是輕的丧服，說有着輕的丧服的人不参与祭祀，那末有着重的丧服的人不参与祭祀就用不到說了。用不到說人家都懂，就不必說，这又是适于用簡的場合。象举出《詩經·豳風·七月》和《礼記·儒行》來說明繁。《七月》全面地叙述农民在一年中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，叙述面广，內容比較丰富，用簡單的話无法表达。《儒行》里要全面而細致地讲述儒者的行为操守等，把它們分为十六种。那样的內容也不是簡單的話所能說明的，內容决定了它采用繁的写法。再象《日知录·文章繁簡》里引《孟子》的一段話，說有人送一尾活魚給郑国子产，子产叫人养在池里，那人煮来吃了，回报道：“剛放到水里，还不活动，一会儿就活跃了，得意地游走了。”子产說：“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”那人出來說：“誰說子产聪明，我已把魚煮来吃了，他还說：‘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’”《日知录》說：“此必須重迭而情事乃尽。”这里用了四个“得其所哉”，重

复了三次，可以算繁了。可是只有这样重迭，才能把两个人的神情态度表达出来。这个例子可以说明“或博文以該情”，用繁复重迭的写法来完备地表达神情。

再看隐显的表达方法适用的场合。先看显，刘勰提出断决和昭晰的要求。象規章契約等文字，要求明确，毫不含糊；象分析事理的文章，要从表象到本质洞若观火。这些都需要明显的表达法。再看隐，刘勰提出五例：一，微而显。象《春秋》僖公二十年：“梁亡。”其实是秦灭梁，不写秦灭梁而写“梁亡”，是含有梁国君主暴虐，自取灭亡的意思。这个意思没有说出，所以是微。虽然没有说出，但当时人看了“梁亡”都知道这样写的用意，所以是显。二，志而晦。《春秋》宣公七年：“公会齐侯伐萊。”用“会”字，表示鲁公事前不知道，倘事前知道得用“及”字。这样写意义比较隐晦。三，婉而成章。《春秋》桓公元年：“郑伯以璧假（借）許田。”郑国拿田来和鲁国交换許田，因价值不相当，加上块璧。照规矩，諸侯的田不能互相交换，所以写成用璧来借許田。这是避諱的說法。四，尽而不污。《春秋》桓公十五年：“天王使家父来求車。”照礼节，天子不能向諸侯要东西，这里老实写出，不加隐諱。五，惩恶而劝善。《春秋》襄公二十一年：“邾庶其以漆、閭丘来奔。”邾庶其没有名望，他的名字没资格写到《春秋》里去，因为他带了土地来投奔，孔子憎恶他出卖祖国的土地，所以記上他的名字显示他的罪状。这样看来，五例中后两例很明显，并不含蓄。前三例就是修辞学上說的婉曲格和諱飾格，我們說話和写作有时候也会用到的。

最后，还得指出繁簡和隐显的关系。由于内容丰富，要明显地把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，不得不繁，繁是为了求显。要是没有丰富内容，繁了就噜嗦，完全要不得了。由于有的話要含蓄，含蓄了才

耐人寻味，所以求簡。不簡，把話說尽了，味同嚼蜡，人們就不要看，所以簡是为了求含蓄，和隐有关。

夫作者曰“聖”，述者曰“明”①。陶鑄性情，功在上哲，夫子文章，可得而聞②，則聖人之情，見乎文辞矣。先王聖化，布在方冊，夫子風采，溢于格言；是以远称唐世，則煥乎為盛；近褒周代，則郁哉可从③：此政化貴文之征也。郑伯入陈，以文辞为功④；宋置折俎，以多文举礼⑤：此事迹貴文之征也。褒美子产，則云“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”；泛論君子，則云“情欲信，辞欲巧”⑥：此修身貴文之征也。然則志足而言文，情信而辞巧，乃含章之玉牒，秉文之金科矣。

古人說，創造的叫做“聖”，繼承的叫做“明”。从政治教化上的創造看，通过教育来改造人們的性情，它的功效特別显著地表现在孔子教育他的学生上。孔子实施教化的言論文章，是可以看到的，那末聖人的思想感情，在文辞中也可以見到了。古代聖王的教化，載在书本上，孔子的文采，充滿在他的格言里；因此他讲到遥远的唐尧时代，便說文化照耀啊已經丰富；他贊美較近的周文王武王的时代，說文化燦爛啊可以遵从：这是政治教化借重文章的凭証。春秋时代，郑国国君用兵打进陈国，郑国的子产用文辞解释了晋国的責問，显出文辞的功效；宋国接待貴宾，举行隆重的宴会，会上发言富有文采，合于礼节：这是行动上著重文章的凭証。孔子贊美子产，說，“言語用来充分地表达心意，文采用来充分地修飾言語”；孔子一般地談到君子，說，“感情要真实，文辞要美好”：这是个人的修养上著重文章的凭証。那末，心意要充分表达，言語要有文采，感情要真实，文辞要美好，便是讲究文章的金科玉律

了。

①《礼記·乐記》：“作者之謂‘聖’，述者之謂‘明’。”原意是指能够制礼作乐的是聖人，能够继承聖人的制作的是賢人。刘勰讲文章，要从聖人的創作讲起，所以引了这两句話。

②陶是制瓦器的，鑄是冶工。陶鑄是像陶人冶工制器那样把人教育改造成为有用的人才。上哲，聖人。夫子，孔夫子。这里說的聖人，也是指孔子。

③《論語·泰伯》里，孔子称赞唐尧說：“焕乎其有文章！”焕乎，等于說“光明啊！”文章，指文化，包括政治教化等。《論語·八佾》里，孔子贊美周代說：“郁郁乎文哉！吾从周。”郁郁，状富有文采；从周，指遵从周代的文化。

④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，郑国起兵打进陈国，向当时各国的盟主晋国去报告。晋国質問郑国为什么要侵略小国。郑国子产回答，說陈国領了楚国来打郑国，填塞了井，砍了树木，对郑国犯了罪。郑国向晋国报告了，晋国不管，所以要去討伐。子产的話讲得理由很充足，得到孔子的贊美。

⑤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七年》，宋国接待晋国来的貴宾赵文子，在宴会上宾主的發言都很有文采，得到孔子的称赞。置，办。折俎，把牲体的骨节折断了（即切开了）放在矮桌上；俎，放牲体的矮桌。这是一种隆重的礼节。

⑥孔子贊美子产的話，見《左傳·襄公二十五年》，參見上注④。《礼記·表記》：“子曰：‘情欲信，辭欲巧’”。

⑦含章，秉文，都指掌握文章。玉牒，金科，犹金科玉律，指最可寶貴的規律。

夫鉴周日月，妙极机神；文成規矩，思合符契①。或簡言以达旨，或博文以該情，或明理以立体，或隐义以藏用。故《春

秋》一字以褒貶，喪服革輕以包重②，此簡言以達旨也。邠詩聯章以積句，儒行經說以繁辭③，此博文以該情也。書契斷決以象夬，文章昭晰以象離④，此明理以立體也。四象精義以曲隱，五例微辭以婉晦⑤，此隱義以藏用也。故知繁略殊形，隱顯異術，抑引隨時，變通會適⑥，征之周孔，則文有師矣。

觀察遍及自然界，通曉極細微極神奇的奧妙；然後寫成文章，都合乎規律，使思想跟事物相一致。但表達的方法卻各有不同，有的用簡練的言語來表達意旨，有的用繁富的文辭來包括細微曲折的感情，有的用鮮明的理論建立全篇的主體，有的用含蓄的思想來隱藏文章的作用。所以，《春秋》用一個字來表示贊美或貶斥，《禮記》里用輕喪服包括了重喪服，這就是用簡練的話來表達意旨。《詩經·豳風》里積句成章，聯章成篇，《禮記·儒行》里反復申說，文辭繁富，這就是用詳盡的文章來包括曲折的感情。用文字記載來分別事理，明確得象《易經》用夬卦來表示決斷，用文章說理洞若觀火，明白得象《易經》用離卦來表示火，這就是用鮮明的理論來建立文章的主體。《易經》里用卦來表示事物的四種現象，它的意義精微而曲折隱晦，《春秋》里記事有五個條例，它的文辭婉轉而含蓄不露，這就是用含蓄的思想來隱藏文章的作用。因此知道繁和簡有不同的面貌，隱和顯有不同的表達法，加以抑止或引申的時候，就要看當時的需要，加以變通的時候要適應當前的情況，從周公孔子的文章中去找根據，那末就知道寫作該跟誰學習了。

①日月，指自然界。机，同几，举动合乎事物微妙的变化叫几。規矩，指文章的法度、規律。符契，合同，契約，有兩份，對起來完全相合。

②《春秋》里往往用一個字表示贊美或貶斥，象隱公元年里

記道：“郑伯克段于鄢”。用一个“克”字，贬斥郑伯不能教训弟弟，弄到大动干戈，也贬斥公叔段不守本分，弄到国家分裂。

《礼记·曾子问》里说“緦不祭”，緦（音思）指緦麻，用熟麻布制成的丧服，是一种轻的丧服，穿这种緦麻的不参加祭祀，那末穿更重的丧服的不参加祭祀就不言而喻了。

③《诗经·豳（同邠，音彬）风·七月》分八章，每章十一句，在《诗经》中是一首较长的诗，较全面地讲农业劳动。《礼记·儒行》里讲儒者的行为志节等分为十六种。

④书契，指文字。夬，夬卦，表决断。上古用结绳来记事，事情分不清楚，有了文字记载，就分清了。这象夬卦，表示判断清楚。昭晰，明白。离，《易经》离卦，离用来象火，表示文章明显得象火那样。

⑤四象，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有实象，有假象，有义象，有用象，四象指用六十四卦来表示各种现象。卦是符号，从符号上看不出各种现象来，所以它的意义是曲折隐晦的。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里讲到五种写作条例：一曰微而显，二曰志而晦，三曰婉而成章，四曰尽而不污，五曰惩恶而劝善。这五种中只有前三种是隐晦的。

⑥会适，当作适会，指适应各种情况。

是以論文必征于聖，窺聖必宗于經。①《易》称“辯物正言，断辞则备”；《书》云“辞尚体要，弗惟好异”。故知正言所以立辯，体要所以成辞，辞成无好异之尤，辯立有断辞之义。虽精义曲隐，无伤其正言；微辞婉晦，不害其体要。体要与微辞偕通，正言共精义并用；聖人之文章，亦可見也。顏闔以为仲尼飾羽而画，徒事华辞③。虽欲譬聖，弗可得已。然則聖文之雅丽，固衡华而佩实者也。天道难聞，犹或钻仰；文章可見，胡宁勿思？若征聖立言，則文其庶矣。

因此論文章一定要從聖人那里找到根據，要窺測聖人的意思一定要以經典作標準。《易經》里說：“分清各種事物來建立正確的理論，使語言有決斷，而辭意完足。”《書經》上說：“文辭講究得體，不只是愛好奇異。”因此知道建立論點必須用正確的言辭，有了得當的體制才能下筆成文。這樣寫起來，文辭就不會有獵奇的毛病，有了明確的論點，文辭的含義也就會更加確切了。縱使精妙的意義寫來曲折隱晦，也並不會妨礙論述的正確；雖然文辭含蓄婉轉，也並不會損害它的體制。簡要的體制和含蓄的文辭都有聯繫，正確的論點和精妙的意義一起運用，這些在聖人的文章里都可以看到。顏闔認為孔子在鳥的羽毛上畫文采不過徒然講究華麗的辭藻而已。其實他縱使要詆毀聖人，還是詆毀不了的。那末聖人的文章既內容正確，又文采華麗，原本是又有文華又有內容的。自然界的道理很難領悟，有的人還要鉅研；文章的道理可以看到，為什麼不仔細考慮呢？倘使從聖人那里去找根據來立論，那樣的言論也就差不多了。

①這兩句根據重寫本。另一本作“子政（劉向）論文，必征于聖，椎圭（匡衡）勸學，必宗于經。”據趙萬里先生考證，認為不對。

②《莊子·列御寇》里講到顏闔詆毀孔子的話。

贊曰：妙極生知，睿哲惟宰。精理為文，秀氣成采。鑒懸日月，辭富山海。百齡影徂①，千載心在。

總之：精妙的極點要推聖人，聖人的智慧作為主宰。憑着精微的理論作文，秀麗的風格構成文采。觀察明白得象日月高掛照見萬物，文辭繁富得象山和海。聖人的形體經過百年雖然成為過去，可是聖人的思想經過几千年還存在着。

①影徂，猶形逝，形體消失。徂，往。

《宗 經》

《宗經》是刘勰《文心雕龙》的第三篇。这篇里开头的一段对經典作了說明，因它跟写作的关系不大，节去了。这篇称为《宗經》，意思是說，各种文章的体裁都应该效法經书。这点对我們說来没有什么意义，我們談写作，并不要去效法《五經》。可是刘勰为了要說明“宗經”的理由，就推究各种文体的源流、特点，接触到写作的利弊，成为全书的文体总論。这方面还可供我們借鉴。

他讲《五經》文字各有特点，实际上是讲五种不同的写作方法。（一）“《易》惟談天，入神致用。”《易經》只是讲天道，但它的目的还是致用，所以要“言中”，話要說得中的。用現在的話來說，好比务虚。务虚的目的为了实用，一定要针对一定的目的而說。这是一种写法。（二）“《书》实記言”，“文意晓然”。《书經》是記錄各种文告宣言的，要求意义明白。这是說，象文告、宣言之类的文章，一定要写得意思非常明白。（三）“《詩》主言志，摛風裁兴，藻辞譎喻。”《詩經》的言志，是通过起兴、比喻，运用辞藻的。象《关鵲》，就用鳥儿的叫声来起兴，引出男子对少女的想念。象《碩鼠》，就是把貴族老爷比做偷吃庄稼的田鼠。这种手法，适用于表达深切的感情，所以說“故最附深衷矣。”（四）《礼》是“章条纖曲”，規章条例，細密完备。这种文字极其严密，不能稍有疏漏，更不容許有歧义，是另一种写法。（五）《春秋》“一字見义，五石六鵠，以詳略成文；雉門两观，以先后显旨。”这是讲叙事文的写法。古代讲叙事文，主张在叙事文中作者不要插进去发議論，作者只要把事情經過讲清楚就行了。作者的意

見，可以在敘述的方法上或用字上顯出來。要是作者插進去發議論，就會把情節的發展打斷了，那不是敘述的好方法。不僅《春秋》是這樣，後來的《史記》也這樣，司馬遷在敘述中一般不插進去發議論，他有議論，等敘述完了用“太史公曰”來說明。劉勰在這裡指出敘述文的嚴謹，他舉了兩個例子：一是五石六鷁，一是雉門兩觀。

《春秋》僖公十六年：“貫（隕）石于宋五，六鷁退飛過宋都。”
《公羊傳》說明道：“曷為（為什麼）先言‘貫’而後言‘石’？記聞，聞其墜然（狀聲），視之則石，察之則五。曷為先言‘六’而後言‘鷁’？‘六鷁退飛’，記見也，視之則六，察之則鷁，徐而察之則退飛。”先說哪個字，後說哪個字，都有講究。怎樣講究呢？要靠實地觀察。是先聽到有東西掉下來，後來看到是石，所以先說“貫”，後說“石”。先看到六只鳥，後來才辨明是鷁，所以先說“六”，後說“鷁”。要這樣根據實地觀察，極其準確地進行記述。
《春秋》定公二年：“雉門（宮門）及兩觀災。”《公羊傳》說明用“及”字，表示雉門重要，兩觀不重要，有分別輕重的用意。這是說明敘述文的方法。

劉勰根據這五種不同的寫作方法，說明各種文體的淵源。議論本于《易經》，詔策章奏本于《書經》，賦頌歌贊本于《詩經》，銘誄箴祝本于《禮經》，紀傳盟檄本于《春秋》。以上各種文體，都是從《五經》，也就是從這五個寫作方法里產生出來的。

劉勰又說明效法經書來寫作有六種好處，實際上就是根據五種標準的寫作方法得到的好處：“一則情深而不詭”，象《詩經》那樣感情深厚而不偏邪，就是所表達的思想感情既深厚又正確。“二則風清而不雜”，風格純粹而不混雜，指根據不同寫法所造成的不同風格。“三則事信而不誕”，象《春秋》那樣敘事，嚴格根據實地觀察，自然真實而不浮夸。“四則義直而不回”，意義正確而不偏

邪。“五則体約而不蕪”，象《春秋》的文辭極精煉而不繁冗。
“六則文麗而不淫”，象《詩經》也用辭藻但並不浮靡。這六點好處，是寫作上的很高的要求，對我們說來還是有用的。象“不詭”“不回”，就是要求思想感情的正確；“不誕”“不淫”，就是反對浮誇浮靡；“不雜”“不蕪”，反對龐雜繁冗，這些正是我們所要防止的。

最後還要指出這篇中有些不正確的意見：一，劉勰認為《五經》的文章有上述六種優點，此外“楚艷漢侈”，《楚辭》漢賦都有流弊，都比不上《五經》，就是只有《五經》的文章最好。這是不正確的。《五經》中有好的文章，也有不好的文章，並非都好，其中所表達的思想感情也有不正確的，並非都正確。漢賦誠然有些浮誇，但《楚辭》中的屈原賦是偉大的作品，在文學史上跟《詩經》同樣重要，不能用《詩經》來貶低它。二，作者對《詩經》所贊美的是“溫柔在誦”。照我們的看法，《詩經》中最好的作品象《碩鼠》《伐檀》，對貴族老爺的譴責是很激烈的，並不是所謂溫柔敦厚的。三，又說“百家騰躍，終入環內”，是跳不出《五經》的圈子。取法《五經》是“仰山而鑄銅”。這也是不正確的。就以劉勰所舉的各種文體說，象賦，班固說：“賦者古詩之流也。”是從詩演變出來的。可是它既獨立成為一種文體，就和詩不一樣。象傳記，是從《春秋》演變出來的，可是司馬遷的列傳，跟新聞標題般的《春秋》記事，有很大不同。因此不能說各種文體跳不出《五經》的圈子。劉勰說寫文章取法《五經》是仰山鑄銅，是以《五經》為礦藏，只要從《五經》里去采礦來提煉就行了。這個比喻，後來顧炎武也用了。他說：“嘗謂今人纂輯之書，正如今人之鑄錢。古人采銅于山，今人則買舊錢，名之曰廢銅，以充鑄而已。”（《日知錄·與人書十》）他講學術研究，反對把古人的東西抄抄編編算著

作，主張掌握大量資料加以研究分析提煉，那是對的。劉勰講的是寫作，我們認為寫作的源泉是生活，寫作所要採掘的礦床應該也是生活而不是《五經》。《五經》中好的作品可以作寫作的借鑑而不是從中去採掘。《宗經》篇里雖有這些不正確處，但就它講文體的淵源，五種不同的表達法，寫作要追求的六點好處等方面看，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。

夫《易》惟談天，入神致用。故《系》稱旨遠辭文，言中事隱①。韋編三絕，固哲人之臚淵也②。《書》實記言，而訓詁茫昧，通乎爾雅③，則文意曉然。故子夏嘆《書》，昭昭若日月之明，離離如星辰之行，言昭灼也。《詩》主言志，詁訓同《書》，摛風裁興，藻辭譎喻，溫柔在誦，故最附深衷矣。《禮》以立體④，據事制范，章條纖曲，執而后顯。采掇片言，莫非寶也。《春秋》辨理，一字見義，五石六鶴，以詳略成文，雉門兩觀，以先後顯旨⑤。其婉章志晦，諒以邃矣。《尚書》則覽文如詭，而尋理即暢；《春秋》則觀辭立曉，而訪義方隱。此聖文之殊致，表里之異體者也。

《易經》只是講天道，講得出神入化，所講的道理，也可以應用到其他方面來。所以《易經·系辭》里說，《易經》的含義深遠，文辭精美，話說的得當，所指的事物的意義又很含蓄。孔子讀寫在竹簡上的《易經》，編竹簡的皮帶斷了三次，它本是聖人探索學問的奧秘的寶庫啊。《尚書》是記錄宣言文告的書，它的語言太古不容易明白，用後世通用的語言加以解釋，那末文意便很清楚。所以子夏贊美《書經》，象日月的光彩那樣照耀，象星宿的排列那樣分明，是說記載得非常明白。《詩經》用來表達意志，它跟《書

經》一样需要用后代的語言解釋，發揚民歌特點，採用比興手法，文辭美好，比喻巧妙，風格溫柔，所以最合於表達深切的情懷了。

《禮經》用來建立體制，根據事實來制定規範，條例細密詳盡，照着實行起來，功效顯著。其中的片言只語，都很寶貴。《春秋》分別是非，用一個字來顯出褒貶，說隕石五塊，六只水鳥倒飛，文字記載或詳或略；說宮門和門前的兩觀失火，先記宮門後記兩觀，來顯示宮門重要兩觀不重要的用意。它的文筆婉曲，用意隱蔽而深遠。《尚書》看文字好象古奧，探討它的意義却很明白；《春秋》的文字一看就懂，探討它的意義却很隱蔽。這是由於經書的文字的不同和體例的不同所造成的。

①《系》，《系辭》，是解釋《易經》的傳文。言中，話說得中的。事隱，《易經》里也有事例，這些事的用意不明顯。

②驪，黑龍。驪淵龍潛伏的深潭。龍的下巴有個珠子，為精華之物，此處以得到珠子比喻得到文章的精義。

③訓詁，解釋古語，這裡作古語解。茫昧，不明。爾雅，近正，近乎標準，指用標準話來解釋。

④《禮》，《周禮》《儀禮》《禮記》都可稱《禮》，所以這裡譯作《禮經》。

⑤五石六鷁，雉門兩觀，見上說明。

至根柢槃深，枝葉峻茂，辭約而旨丰，事近而喻遠。是以往者雖舊，余味日新。後進追取而非晚，前修文用而未先，①可謂太山遍雨，河潤千里者也。

經書中的文章根柢深固，枝葉繁茂，雖語言簡練而意義豐富，敘事淺近而喻意深遠。因此這些以前的文章雖然是舊的，可是體會